



向中国读者介绍“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是鲁迅早年就怀抱的理想,到了晚年更为坚定。鲁迅不翻译英美作品,主要原因在于他不能用英文做翻译,而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通过第三种语言如日文或德文来重译吃力不讨好。鲁迅绝没有轻视英美法德诸大国的意思,他为什么会特别重视东欧文学?既有文学的原因——他们确有优秀作家和作品,也有社会原因,境遇类似,翻译过来作为他山之石,最为切近。

## 鲁迅与法国文学

■顾钧

自1907年《摩罗诗力说》发表以来,鲁迅一直高度重视对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译介。上世纪30年代中叶,林语堂嘲笑鲁迅一向不去翻译英美法德诸大国的著名作品,却专译小国的文学,“此与妇女新装求人时一样,总是媚学一事不是。”(《今文八弊(中)》)鲁迅生气地反击道:“介绍波兰诗人,还远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只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介绍波兰诗人,捷克文豪,又何必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以闻之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至三)》)

这里因为被林语堂激怒了,行文不免有点意气。翻译英美法德诸大国的文学作品也对中国有益,事实上鲁迅最早翻译的恰恰是法国的雨果,又翻译过德国的尼采,他在《摩罗诗力说》里首先介绍的就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兼及彭斯与济慈;后来又安排别人翻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翻译这些大国强国的文学,并不一定是用了势利的眼睛看。鲁迅不翻译英美的作品,主要的原因应当在于他不能用英文做

翻译,而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通过第三种语言如日文或德文来重译,肯定吃力不讨好,也没有必要。鲁迅绝没有轻视英美法德诸大国的意思;他这里要解释的其实只是自己为什么会特别重视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指出这里既有文学的原因——他们确有优秀作家和作品,而同时也有社会的原因,境遇类似,翻译过来作为他山之石,最为切近。

鲁迅于1903年翻译了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署名“庚辰”(载《浙江潮》第5期,未收),发现后重新发表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并有译者附言,一般认为这是鲁迅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当时鲁迅对雨果十分崇拜,曾专门购买了八大册的《叢俄(雨果)作品选集》。《哀尘》原是《随见录》(Choses vues)中的一篇,题为《芳汀的来历》(L'origine de Fantine),写妓女芳汀的不幸遭遇,后来作者将这一事件写入《悲惨世界》第五卷。

在1906年弃医从文之前,鲁迅一直对科学的作用和价值深信不疑。20世纪初叶,为了启迪民智,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科学小说的译介工作,鲁迅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由于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巨大变革,科学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不少英美作家如R. L. 斯蒂文森、爱伦·坡等都曾经尝试过这一小说文类,但成就和影响来说都远远不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中国近代翻译的科学小说也以凡尔纳的作品为最多。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鲁迅早期重要的翻译作品,也是他一生出版的仅有的两部法国文学译著,前者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后者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月界旅行》即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 1865),《地底旅行》即《地心游记》(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1864),鲁迅的译文均由日文转译而来。在鲁迅留学的前夕,日本有过一阵科学小

说热,翻译家井上勤等人译出了凡尔纳的大量作品,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将鲁迅译本《月界旅行》与原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鲁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了不少改动,其中最明显的是删节。《月界旅行》原书二十八章,而鲁迅的译文只有十四章。通过对照不难看出,有的章节只被略加删节,基本保持原貌,另外一些章节则被大量删节,与其他章节合并,还有一些则被完全删去。鲁迅译本第五章还将原作第十一章被大量删节后的内容移至同样被大量删节的第九、十章之间。原作的第五、六两章,鲁迅完全删去,没有翻译,估计因为它们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背景知识,并且打断了故事的进展。鲁迅据为底本的井上勤的日文译本《月世界旅行》是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相对于凡尔纳的原文来说已经有所删改,到鲁迅的译本又进一步有所删节改易,但主要情节基本保留。

鲁迅的译本经过这样一番大刀阔斧的删节合并,“截长补短”,使得每一回的字数基本相等——而不是像原作那样,有的章节字数多,有的章节字数少,如十六章几乎是十七章的七、八倍,在体例上十分接近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这种接近更明显地表现在每回的回目上,鲁迅完全放弃了原书的标题而代之以自拟的七字或八字的对偶句。比如原书第一章是“Le Gun-Club”(《大地俱乐部》),鲁迅译本的第一回是《悲天怀人怀旧,破寂寥社长吟书》。

既然在字数、回目上刻意模仿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那么在每回的末尾,也就不能不配套地出现章回小说所常见的套话。以第一章《大炮俱乐部》为例,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根据原文直译是这样的:“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着下面几句话:‘大炮俱乐部主席荣幸地通知他的会员,他将在本月五日的会议上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因此,他请求他们接受这次邀请,届时放

下一切事务,前来参加会议。大炮俱乐部主席因倍·巴比康十月三日于巴尔的摩。’”试比较鲁迅的译文:“到了次日,忽见有个邮信夫进来,手上拿着书信,放下自去。社员连忙拆开看时,只见上写道:‘本月五日集会议时,欲议一古今未有之奇事。谨乞同盟诸君子莅临,勿迟是幸!枪炮会社长巴比康十月三日书于拔尔法摩。’社员看毕,没有一个晓得这哑谜儿,惟有面面相觑。那性急的,恨不能立刻就到初五,一听社长的报告。正是:壮士不甘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显然,“社员看毕”以下的内容为原文所无,是译者为了照顾章回小说的体例增加的。这样,鲁迅译文的改动就不仅仅表现在大量的删节方面,也表现在少许的增加——主要出现在每回的末尾,但也有在章回当中的——都是译者兴之所至,随手添加的。如第一回中竟出现了陶渊明的诗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使不对照原文,也可以知道这是译者取便发挥擅自添加的。

除了上述种种比较大的改动之外,在具体的字句翻译上,鲁迅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同样是有增减的。例如上文所引第一章的末尾一段,原文只说“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译文中却多出一个“邮信夫”,原信中强调“大炮俱乐部主席”将“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而译文却改为“议一古今未有之奇事”。

不必再举更多的例子就可以有这样的结论:文字的增减变化是鲁迅翻译这两部科学小说的明显特点。这样的译本显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只能看作译述,或改作。鲁迅这么做,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为了照顾当时的读者。他在《月界旅行》“弁言”中介绍自己的翻译体例,有一条就是“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既然能够删,也可以加,尽管这一点鲁迅未尝明言。

根据某种需要改变原文是

当时中国翻译界流行的风气。自林纾以来,许多译者将外国小说改造成中国小说的样子。鲁迅后来彻底改变了翻译策略,决定不再仿效“近世名人林琴南”(《域外小说集》“序言”),采用直译甚至“硬译”的方法,但此时却不能不受他的影响。后来鲁迅颇有悔其少译的意思,在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因为向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除了雨果、凡尔纳,鲁迅留日期间对莫泊桑也很欣赏,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合作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中收入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月夜》。鲁迅还有计划翻译他的长篇小说《人生》,但后来没有落实。

同样没有落实的还有高庚的散文集《诺阿,诺阿》。法国后期印象派大画家高庚一度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隐居数年,后来写成这一部散文集,非常有名。鲁迅早就读过此书的德文译本(详见1912年7月11日日记)。1933年左右鲁迅有意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特别写了一则出版预告:“作者

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活了好几年。此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图十二幅,现已付印。”最后四字似乃商业广告,事实上并没有付印,也看不到鲁迅的译稿,估计他尚未来得及动手。所谓“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乃鲁迅为躲避国民党出版审查使用的障眼法,译者署名“罗阮”——鲁迅众多笔名中的一个。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很少翻译法国文学作品,直到晚年定居上海后才重拾早年的兴趣。1928年他翻译了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代表作《跳蚤》:“跳蚤,朋友,爱

人, / 无论谁,凡爱我们者是残酷的! / 我们的血都给他们吸去。 / 阿呀,被爱者是遭殃的。”(载《奔流》月刊第1卷第6期)这首短诗非常有名,不仅视角独特,也很深刻。对照法文原文(Puces, amis, amants même, / Qu'ils sont cruels ceux qui nous aiment! / Tout notre sang coule pour eux. / Les bien-aimés sont malheureux.)不难发现,鲁迅虽然从日文本转译,但深得原诗的神韵。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篇是纪德的《描写自己》(载1934年《译文》月刊第1卷第2期),鲁迅在“译者附记”中写道:“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分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纪德的这篇自叙自传,性格和创作的特色,被鲁迅选中并优先翻译过来,是不难理解的。

向中国读者介绍“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是鲁迅早年就怀抱的理想,到了晚年则更为坚定。他在1934年9月为《译文》月刊所写“发刊辞”中说:“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这段话再次说明,虽然鲁迅本人翻译俄苏东欧的文学作品为多,但他的视野绝不受此局限,他的眼光是世界性的。

除了阿波利奈尔、纪德,鲁迅还翻译过法国作家路易·菲立普的《捕狮》(《食人种的话》)(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第一册《奇剑及其他》,1929年4月出版)。鲁迅晚年对法国作家法朗士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建议江绍原、黎烈文等加以译介。1936年2月1日他致信黎烈文,评论惠赠所译《企鹅岛》,称赞法朗士的作品“精博锋利”。

## 我与闽教社淡雅如水仙的情缘

■龙平平

差不多将近20年了,每个春节前,我们毛家湾的许多办公室里都会采一盆盛开的水仙花,整个楼道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这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给我们的福利,是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永远也割不断的一份珍贵情谊。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虽然一辈子研究党史文献,却疏于笔耕,著述不多。但在我不多的著作中,有四本书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其中一本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本获得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这份荣誉,对我是非常难得的骄傲与光荣。

上世纪90年代,是人人都想干事情的时代。改革开放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红利,人们憋着一股劲,要用辛勤劳动创造新的生活,回报那个时代。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懂得回报的人。

那时候,教育社垄断教材出版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原本端着金饭碗的教育出版社被迫走向市场寻找新的定位。

这就给了想做事情的人一个机遇,也撮合了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一份情缘。

1997年是个大年份,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和中共十五大召开,这些大事件是出版界关注的重点选题。其时,中央决定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电影,抽调我当编剧,住在北太平庄的远望楼宾馆。远望楼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很近,我的两个朋友王卫国(后任全国妇联宣传部)、田慧生(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经常来找我聊天,经他俩介绍,我结识了前来北京组稿和策划选题的黄旭。黄旭当时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

他与我年龄、经历都相仿,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对改革开放抱有朴素感恩之情。我们俩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朋友。没多久他就正式向我约稿,希望能给他他们出版社写一本宣传研究邓小平的专著。起初我很纠结,一是当时研究邓小平的书籍很少,要求很高,我能不能胜

任,没有自信;二是我工作任务很重,压力很大,没有把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这样一本高品位的书籍;三是这种政治书籍交给一个边远省的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否合适?心里没底。

黄旭显然是认真地做了功课的。他拿出一大摞复印件的文章对我说:我搜集和拜读了这些年来你在报刊杂志发表的一些研究邓小平的文章,发现你写的理论文章中带着浓厚的个人感情,这种对邓小平的崇敬和感恩之情是学人中普遍存在的感情,因而即便是理论文章,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鼓动性。只要用一个合理的结构把这些文章串联起来,做适当的补充和加工,就是一本很好的专著,一定会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他鼓励我说,做这本书对你并不难,但对我们出版社却很重要。我们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决定把这本书作为出版社开拓新领域的一个重要开端。我们一定认真地做好,恳请你给予支持。我被他们的

真诚深深地打动了。那时候,国内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那些文章的,这要花费多少的功夫?我以前出版过不少书籍,还从未碰到过像这样热心为作者服务的出版社。由是,我二话没说,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大概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完成了共14章35万字的书稿《邓小平与他的事业》。送审很顺利,只是有人对引言中的一句话“我与邓小平有缘”提出疑问,认为这样说会让读者产生歧义,以为作者和邓小平有特殊的关系。黄旭来找我商量要不要删去或修改,我解释说:“我与邓小平有缘”中的“我”,不光是作者一个人,而是“我们”,这个“我们”是全中国所有的人,包括对这句话提出质疑的那个人。邓小平是改变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人。”所有中国人都与邓小平有缘。为此,我们还现场做了实验。找几个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朋友分析他们各自的重要经历,结果每件事情都确实与邓小平有关。

《邓小平与他的事业》出版时适逢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引起了广泛地关注,第一次就印了2万多册,还专门印了精装本。《光明日报》组织召开了出版座谈会,并用一个版面刊登了石仲泉、伍杰等专家的发言,对宣传邓小平理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本书被评为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和华东地区优秀图书奖。

《邓小平与他的事业》为我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开了个好头。接着又出版了《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备忘录》和《走进小康——十五大以来的中国》。这期间,黄旭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多次来京或请我去福建,研讨和论证编写出版一套《邓小平理论》学生读本项目。经过周密论证和精心准备,在福建省教委和出版社的组织、指导下,终于完成了我主持编写的《邓小平理论》小学版(上下册)、初中版(上下册)和高中

版一册共五本。这套学生读本作为辅助教材在福建省大中小学校试用了3年,这在全国是鲜见的的事情,对于帮助大中小学生学习了解和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这套丛书中的初中读本被破格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种荣誉是中学辅助教材中从未有过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反映了福建教育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眼界、能力和素质。我一直为能结识这样的朋友感到荣幸和自豪。

最近十多年,因为一直忙于一些大项目,实在腾不出时间写书了,多次辜负了黄旭社长的美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终生的情谊。每年春节,当淡雅的水仙花香弥漫在毛家湾楼道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远在福建的朋友,默默地祝福福建教育出版社兴旺发达,祝福远方的朋友们岁月静好,快乐健康。



立足教育 服务社会  
开智启蒙 惠泽生命